

改革开放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 话语体系的科学性的研究

刘 勇

(中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话语体系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时也出现了不成熟、跟风与脱离政治实际等方面的问题。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开始了一个艰难的反思历程:它以理性的方式认识到了自身必须遵循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是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它对其特殊性进行独立思考,并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之处,正在于其革命性;它认识到事物的个别性,其根本上是社会主义的性质。经过从普遍性、特殊性到个别性三个方面的反思之后,中国的话语体系的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是话语体系经过反思之后获得的是一种理性认识,它仍然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因此,从实践中去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的科学性是科学的理解方式。获得理性认识的中国话语体系,只有在物质生产实践、科学文化实践与社会政治实践中实现出来,它的科学性才能得到完善和发展。

关键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物质生产实践;科学文化实践;社会政治实践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292(2021)06-0054-09

话语体系是话语主体依靠言语行为的形式来进行理论输出的思想体系。差不多十年前,也就是2012年6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1]这一讲话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五年之前,也就是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总书

记提出了“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2]。这一讲话在整个理论界、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大都面临着“西强东弱”的“话语霸凌”的局面,意识到中国自身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性,都纷纷开始从整体上或者从本学科视角出发,开展话语体系建设的研究。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话语体系建设,它取得了不错的理论成果,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产生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作者简介:刘 勇,男,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城市空间理论等。

这些问题需要学者们共同去反思和解决。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等诸多学科的“大融合”，也是通常意义上说的“大文科”。顾名思义，“大文科”既然被称之为哲学社会科学，也就是说它是一门科学，具有科学性，它的话语体系也具有科学性。“科学性，是中国特色话语和话语体系首要的基本特征。”^{[3]32}所谓科学性，简单来说是指人类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认识具有客观性、系统性与一致性，对客观规律具有正确反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重点在于内容的建设，建设的标准是科学性、彻底性。”^{[4]35}不过，检验话语体系的科学性的标准不是科学性本身。众所周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指出实践对认识具有本原的、决定的作用。“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5]284}我们对某种事物的认识需要从实践中来考察，而非仅仅就认识谈认识，即便它是科学的认识或者科学本身。因此，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的科学性，不能仅仅从这种科学性本身来理解它，而应从产生科学性的实践来理解——以科学的方式来理解科学性，即它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具体的历史的过程。人类实践的具体形式多种多样，从内容上看，实践一般分为三种基本类型，本文具体从物质生产实践、科学文化实践与社会政治实践三个方面展开研究。

一、物质生产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它起初处于不成熟的状态。这种不成熟的状态从认识上源于过多停留于非理性与知性认识的阶段。非理性认识包括直觉或直观，直觉可以理解为直观感觉，不经过中介过程就能直接实现主客统一的认识。直观侧重于人在空间性中“观”的动作行为，直觉侧重于人在时间性中“觉”的心理状态。处于直觉状态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秉持着“隔行如隔山”或“道理都是相通的”的意识，前者将各个学科孤立起来，具有孤立的排斥性，反对对话语体系进行普遍性思考。当前的学科分工体系确实为这种“隔行如隔山”提供了理由。学科分工源于社会分工，社会分工是通过更好的协作以提升社会生产力。由此，我们可以看

到，学科分工的目的不是各自为阵，而是为了通过学术协作来促进学术发展。“隔行如隔山”只是直觉地发现了学科的差异，而没有考虑到差异本身是为了形成协作的同一的目的，即为了指导实践。后者坚持抽象的普遍性或者片面的抽象性，使得话语体系成为无规定性的存在。“道理都是相通的”也是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普遍流传的不成文的“教义”。事实上，能够领会到“道理都是相通的”的真谛是经过艰苦的思维训练和实践探索，方才可能获得。但是一旦将“道理都是相通的”的教义形式束之高阁，它不能返回到个别性或者说不能在个别性中实现出来，那么它就成了看似无所不包，实则空洞饶舌的教条。总而言之，两者的共同点在于反对话语体系的中介性，即不肯定对话语体系的反思或否定。

知性可以理解为人通过外在反思产生了外物的感性形象，而外在反思形成了主客坚硬分离的认识。处于知性状态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秉持着对整体的划分意识。“话语体系由意识形态、理论、话语权三个部分构成，意识形态是话语体系的核心内容，理论是话语体系的外在形式，话语权是话语体系的现实手段。”^{[6]5-12}但是话语体系是如何形成统一整体，处于知性思维不得不求助于外在反思。外在反思对意识形态、理论与话语权的分析形成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立关系。意识形态和理论统称为大写的理论。话语权是话语与权力的结合，话语能转化成权力，同样，权力也可以生产和限制话语。因此，话语权是理论实践。理论实践可以将意识形态转化成科学。如果大写的理论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属性，而不经过程论实践的过程，那么它就会被认为是虚假的、相对的、自利的。一旦经过理论实践，大写的理论被表述为科学的、绝对的与利他的。大写的理论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理论实践的结果是不仅能维护经济基础不动摇，而且能够生产维护生产关系的“科学、普遍与道德”。一旦有人质疑这一理论的生产方式，就被话语权所审查、筛选、剥离、过滤，就会被指责为不科学、不普遍、不道德。但是大写的理论以及话语权终究是上层建筑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外在反思对于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的概念固

然重要,但是它只是看到了理论实践而没有理解制约理论实践的物质生产实践,或者说潜意识地将理论实践与物质生产实践对立起来了。因此,缺少唯物辩证法思维,没有正确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起初并没有依据理性而形成普遍的概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它后来依据理性认识到了自身的普遍性的阶段,并以这种普遍性作为历史前提。我们只有在认识事物的普遍性的同时,才能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事物的普遍性是事物的概念的一个环节,也是人类在无数次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概念。比如说,水果的普遍性就是人类在无数次吃苹果、香蕉等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概念。而我们通常理解的规律是事物之间出现的必然、本质、稳定和反复出现的联系。也就是说,规律是一种对事物的科学的、正确的认识。规律无疑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它是在特定时空下存在的规律。因此,人类追逐事物的普遍性是人类获得规律的内生动力,人类掌握了规律也就获得了一定的普遍性的认识。从历史上来看,人类社会出现过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其他社会主义分为三大类:反动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其中反动的社会主义还分为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三类。”^{[7]54-64}反动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目的都是维护私有制,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虽然批判私有制,但是不主张以阶级斗争来推翻私有制。因此,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性在于将废除人类私有制的目的与阶级斗争的手段结合起来,从而反映出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的客观规律。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近代中国人民认识到了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的普遍性,自觉地找到了救亡图存的规律,从而也就获得了一定的普遍性的认识。根据这个规律或普遍性,中国进行了废除私有制与阶级斗争相统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的

生产关系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家。这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人民认识到了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的客观规律。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为社会主义的建设、改革开放提供了政治前提、经济基础与文化领导权。没有政治前提、经济基础与文化领导权,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就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科学性在于它认识到了自身的普遍性,即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与之后的历史是无法割裂的,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的联系,它必须以这种普遍性作为历史前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科学性,它最终需要在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实践中实现,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坚持完善所有制,以发展生产力为目的。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类永恒的使命——满足人类的生产与生活需要。物质生产实践一刻也不能停歇,否则人类文明将很快不复存在。人类在生产与生活过程中形成了基本经济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基本经济关系的核心。

物质生产实践也称为物质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因为它是人类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前提,而且它还决定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与此同时,生产关系支配和制约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宗教、军事等社会关系,它是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一结论,所有制的改变,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而生产关系的变化又引起社会关系的变化,社会关系的变化又引起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变化。换言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是建筑在所有制之上的。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都还原成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而是自觉意识到作为经济基础的所有制的话语体系从根本上制约着作为上层建筑的其他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不能从自在存在走向自为存在、从自发走向自觉的问题在于它没有理解话语体系所处的时代的阶段特征,而这一时代的阶段特征不是上文谈到的理论实践所规定的。因为理论实

践获得的仍然是认识或社会意识,不具有客观实在性,它们究其根本都由物质生产实践所决定或从社会存在中找出原型。

话语体系所处的时代的阶段特征在物质生产实践方面的体现是,一是中国必须克服与马克思、恩格斯所预估的高度的发达的生产力的现实落差;二是中国又必须促使生产关系适应当前的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既不能超前也不能落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自觉认识到了其自身的普遍性是在经济矛盾的推动下,需要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中的所有制改革,来将这个具体的普遍性实现出来。它自觉意识到它处在这个马克思、恩格斯未曾设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并吸收公有制的公共性和非公有制的灵活性,以深入研究吸收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优势而形成的混合所有制,并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混合所有制。换言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需要以坚持完善混合所有制、发展生产力为目的而展开叙事。

二、科学文化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它起初处于跟风的状态。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的部分跟风者拾人牙慧,咀嚼别人的剩菜残羹,自己的头脑成为别人的跑马场,自己的文章充当了传声筒或留声机的作用。永远为追逐国外前沿话题而阅读别人,但从不用外语写作让前沿学者所阅读。跟风者总是认为国外学者的思想时尚前沿、洞见频现,由此可以自我发挥,撰写大量的翻译体和读后感式论文。重点不是国外学者的思想是什么,而是跟风者的主观阐释。这种主观阐释阐释自己能理解的,对不理解的弃之如彼。问题是如果对于不理解的知识没有真正理解,那么跟风者理解的知识是否形成正确的、完整的理解体系?对于这种利己主义的阐释学,我们不得不抱有质疑的心态。对于不理解的知识,才是国内学者应该重要研究和批判的,但是学术风潮一变,他们马上就拜另一个“码头”。因此,跟风者善于颠倒主次、投机取巧。另外,跟风者大多没有原创力,不善于分辨知识真伪。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普遍情况是原创能力不足,即便提出一些“新

概念”,也因为自身功底并不牢固坚实、概念的论证存在问题或者就不注重论证而难以在学界服众。原创能力不足在跟风者上的表现是借用国外学者的新概念来套用中国的现实情况,不善于分辨知识真伪。比如说,用西方左翼的生命政治来套用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的现实情况,这难道不应该在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的现实情况上与马克思主义的关于疫情的分析中凝结出中国的生命政治学吗?难道不应该用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的现实情况来检验西方左翼的生命政治是否科学吗?难道不应该以中国的生命政治学批判吸收西方左翼的生命政治学吗?跟风者总是认为中国的现实是破碎的、残缺的、有禁区的,他们要借西讽中、借西击中、借西诫中。西方的现实难道不是破碎的、残缺的、有禁区的吗?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论证了贫富分化、现实的种族问题与移民危机,质疑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等,但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反而能够形成它们的话语体系。这不能怪罪于现实,现实的残缺本身证明了跟风者所缺乏的东西存在,跟风者应该怪罪于他们对现实缺乏从科学文化实践中的理解。

当前跟风者现象出现的较为普遍的原因之一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在历史和现在处于主导地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对反对封建主义、蒙昧主义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推动世界历史的进程发挥了关键的引领作用,对促进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也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最终成为私有制中优秀的文化遗产,它目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仍然处于优势地位。为此,跟风者主张学习西方是必要的。如果说从近代以来到新中国建立之前,学习西方各种思潮、寻求救国救民良策是现实的迫切需要。那么改革开放后,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反思苏联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是现实的迫切需要。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8]12}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进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国家现在需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需要的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话语体系,需要的是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后中国接下来如何

发展并走向共同富裕的话语体系。因此,有学者指出了跟风者“粗疏浮浅”的问题本质,并认为中国学术界需要从学徒状态走向自我主张^{[9]1-17}。这当然是不错的主张。不过,学徒状态与自我主张也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过程,中间必须有中介或否定性的环节,这个中介或否定性的环节是否定学徒状态的话语体系这一现实内容,而不是自我主张的外在反思。因为外在反思坚持理智的思维形式,千篇一律地运用这种形式去框架内容,而不将内容与形式统一起来,它没有深入到形式背后的现实内容,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它后来对其特殊性进行独立思考,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我们认识了事物的普遍性之后,需要认识其特殊性,才能更为具体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否则我们可能仅仅认识到抽象的普遍性而非具体的普遍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话语体系。跟风的直接结果就是不愿意扎实地、深入地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体现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个别性是同一的关系。同一性意味着它的本质是包含有差别的同一而非绝对同一,也是不能分割的整全。同一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特定本质,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规定性与自身等同。换言之,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同一性具体体现在其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三者有机组成一个客观性、系统性与一致性的理论体系。而这种差异性在于在组成部分上呈现结构性特征,在内部发展中呈现阶段性特征,在实际运用和推广中呈现地域性的特征。换言之,我们如果不理解这种同一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就难以把握甚至偏离。

当中国学界开始反思跟风者的问题后,开始去独立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同一性。只有在这种同一性中,才能真正把握其特殊性。科学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是普遍真理,它将普遍真理与中国国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真理的特殊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或者说,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的特殊性,而这一特殊性就在于有其自身的规定性。从文化形式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的规定性包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内容。如果暂时抛开“特色”二字,中国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可以直接包括中国的、社会主义的优秀文化,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特色”集中体现在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党领导人民在革命中创造的文化具有革命性,党领导人民在建设及改革中创造的文化同样具有革命性,而这种革命性体现为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对身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革命,不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上层建筑的革命。总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特色”集中体现在它的革命性,而革命性也体现出它自身的中国特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的科学性,它最终需要在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实践中实现,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坚持辩证否定观,提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从学术史的发展来看,外在反思确实是非常必要的学术发展环节。黑格尔在《逻辑学》一书中极力批判了以康德为代表的外在反思,认为他们善于将内容与形式、有限与无限、普遍与特殊、现象与本质等成对出现的范畴视作彼此水火不容的两极对立的语词。黑格尔认为它们实际上统一于概念本身,是概念自身在扬弃它的形式而获得它的能动性,即实现了自身反思。马克思后来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的外在反思,思维中的扬弃不能实现对现实对象的克服,它仍然与现实存在着对立;思维中的对象是自我意识的产物,仍然与客观精神或概念存在着对立;思维具体是意识的高级阶段的一种体现,但是实在主体是物质,思维具体不决定实在主体,相反,实在主体归根结底决定思维具体。当然,马克思也承认这是一种形式的、抽象的批判。马克思抓住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的关键——绝对精神。绝对精神经过否定之否定的环节实现了思维与存在、自我意

识与实体、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的克服。但是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没有现实的本质,它的否定是无内容的抽象的自我意识,成为一种绝对的否定性,因此,它是“超脱任何内容同时又恰恰对任何内容都有效的,脱离现实精神和现实自然界的抽象形式、思维形式、逻辑范畴”^{[8]218}。黑格尔指责康德等人的外在反思,同样黑格尔的辩证法也被马克思认为是一种外在反思。问题的关键不是外在反思,而是外在反思没有深入到现实的本质中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之所以在整体上没有从学徒状态走向自我主张,关键是外在反思没有深入到现实的本质中。现实的本质不是直接能够把握的,而是通过辩证否定得到的本质的现实,即受到外在反思的形式主义所遮蔽的社会现实。“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8]499}马克思指出了新唯物主义要从实践方面来理解现实,将现实看成一个由实践推动的发展过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将中国的传统思想与外来文化吸收进来,形成自身的特色的研究对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必然最终要在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实践中实现出来,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这里需要指出,科学文化实践并非纯粹的意识活动的理论实践,而是起到了改变实践客体从自发到自觉的存在状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只有自觉地坚持辩证否定观,提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才能表明科学文化实践真正起到了作用。中国如何提出自身的话语体系?其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需要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以一种“哲学革命”的精神来批判或否定学徒状态所接受的话语体系,或赋予旧概念以新内涵,或径直提出新概念,或将其合理形式纳入中国的话语体系,站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对西方话语体系的内容进行分解、加工、重组与改造,以实现对学生状态的

话语体系的融合与超越。其二,当代中国需要对传统文化的话语体系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赋予话语体系新的内涵与表达形式,提出中国立场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其三,建立在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实践基础之上,将自身特色的革命性话语体系融入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所有制改革、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等长期性、全局性与根本性的问题中。在直面而不回避这些难题上,我们必须要保持一种“伟大斗争”的精神,否则就容易半途而废。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只有经历过这个艰苦的辩证否定过程,有海纳百川的勇气,才能提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才能真正实现全国上下的文化自信。

三、社会政治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它起初处于脱离中国社会的政治实际的状态。要么崇尚复古并远离社会政治,不能理解其社会主义的性质;要么就没有正确而深入地理解中国当前的现实政治问题,不能理解其中国特色。部分学者躲进书斋,形成一股复古风。“他们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10]219}众所周知,列宁在总结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构成时指出,“马克思是19世纪人类三个最先进国家中的三种主要思潮——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同法国所有革命学说相联系的法国社会主义——的继承者和天才的完成者”^{[11]418}。为此,它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这就意味着,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是包含着这三部分内容的。但是当代部分学者研究的重点是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历史,即从德国古典哲学到现在的法兰克福批判理论,从英法政治经济学到现在的新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从空想社会主义到民主社会主义到激进左翼等。研究这些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当然是学者的自由权利,但是它们的性质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混淆两者性质、打着这些名号的幌子而实质从事复古的学问并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应该坚决批判。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

语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性质。而这些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也是学徒状态的话语体系,脱离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性质的实际。一些国内学者似乎更热衷于继承学徒状态的话语体系的思想遗产,或者还争做国外学者的代言人。如果没有内在批判、没有辩证否定、没有分析鉴别,那么怎么能称得上真正继承遗产?一些国内学者纷纷争做国外学者的代言人,如果没有将那些“学术黑话”与自己的生命体验、生活实践联系起来,那么怎么可能会有真正的自我主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存在着要么回避社会政治,要么没有准确理解中国当前的社会政治,特别是对中国政治的“特色”的理解。三大改造之后,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这为之后的社会政治实践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出现了严重挫折。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改革开放的社会政治实践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母版”,也不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再版”,更不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翻版”。改革开放的社会政治实践赓续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因血脉,开创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版本”。这个“中国版本”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新事物,它是合乎历史前进方向、具有远大前途的存在,符合中国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但是有部分学者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实践的经验来衡量中国特色,不承认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民主。有部分学者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书本上的教条来衡量中国特色,不承认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性质。“中国版本”的特色政治遭到“左右夹击”。但是这种“左右夹击”是一种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政治观,割裂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没有辩证地理解“中国版本”的特色政治。“中国版本”的特色政治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又一切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不仅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思想,而且为取得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

系,它后来认识到必须从中国社会的政治实际出发,认识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以及在与西方的竞争中缺少话语权。我们认识了事物的特殊性之后,最后需要认识其个别性。个别性是一事物区别其他事物的性质,同时它也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回到自身之内的个别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总体上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国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亦简称社会主义的性质。这是一个需要澄清前提、划清界限与指导实践的根本问题。建筑于并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在总体上是资本主义的性质。这不仅仅是两个词的对立,也是现实的本质的对立。但在一些学者看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词是一对空洞的形式,特别是放在似乎是“无/去阶级性”或“价值中立”的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域,美其名曰,它们是人类都要好好继承的共同遗产。这一良好的主观愿望是一种软弱的应当,而不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限制。而这一对限制的话语体系是限制人们关于谈论两者根本性质对立的言论和思想的并具有实际内容的社会结构。换言之,那些强迫人排除两者根本性质对立的言论和思想,同时又让人自我审查的社会潜意识才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受到了西方的限制,并在一定程度上自我设限,固守他者所设的话语边界。

但问题是西方学界、媒体与政界部分人士运用西方话语体系,经常围绕民主人权、新闻制度、司法体制、网络安全、民族宗教、大陆与港澳台关系、与周边国家关系等议题,对我国进行负面炒作。中国媒体与政界人士对此予以了有力回击,而学界似乎总体反驳力度较小。无论如何,中国和西方话语体系斗争的背后实际上反映了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国际话语权的获得必须依靠国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综合层面的支持。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以及综合国力进入到世界前列,完全有能力平视世界了。因此,话语权也应该跟上步伐,匹配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位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科学性,它最终需要在人民群众的社会政治实践中实现,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争取自身的国际话语权,回应中国人民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的现实期待。社会政治实践是人们为了获取政治权力或政治利益而展开的政治活动。在阶级社会,表现为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共产党宣言》指出至今存在人类的文明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它给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乃至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正确的行动指南,给处在黑暗中的苏联、中国乃至世界人民带来了新时代的曙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12]206}特别是这一理论把三大改造完成之后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的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也纳入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人民内部矛盾可以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民主的方法予以解决。但是后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及毛泽东个人的看法转变,毛泽东又将阶级矛盾纳入敌我矛盾,并认为它是主要矛盾。以史为鉴,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政治实践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正确决定,人民内部矛盾是主要矛盾,阶级矛盾是次要矛盾,但是次要矛盾并没有消失。阶级矛盾未必一定是通过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所主张的用激烈的甚至暴力方式解决,中国的三大改造就是以和平方式解决阶级矛盾的成功典范。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的变化,也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的变化,因此国内的社会政治实践必须立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3]9}因此,十九大的判断——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仍然从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社会政治实践仍然处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阶段,特别是要防止将当下社会主义的劳资关系的矛盾理解成敌我矛盾。当下社会主义的劳资关系

从总体上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为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在中国进入到历史博物馆。资方并没有形成制约国家政权的利益集团,它没有形成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利益根本对立的资产阶级。劳资双方是代表了生产力发展不同水平、人民内部不同利益阶层的矛盾,所以社会主义的劳资关系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一些人误解了劳资关系的性质,从而忽视了对劳资关系的量的关系的研究。劳资关系的量的关系体现为劳资关系的不平衡性与不充分性:一方面城乡、区域、行业、部门、领域之间的劳资关系发展不平衡;另一方面处于发展不平衡的低端部分发展不充分,像有些相对贫困地区的资本还没有进入或很少进入,处于发展不平衡的高端部分也存在着发展不充分,像“卡脖子”的行业存在着劳动力素质不高的情况。就当前来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社会政治实践的重点是处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矛盾,并从复古风的书斋走出来,从文字游戏的学术圈走出来,从“流量论文”的论文工厂走出来,从各个学科角度来研究、回应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现实期待。

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阶级矛盾是次要矛盾,国际上的情况正好与之相反,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但是这个矛盾尚未被根本激化。立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社会政治实践需要在把握这种复杂性过程中获取国际话语权。20世纪的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曾经遭受过历史的巨大挫折,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肆虐,资本主义对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的应对与处理,已经昭示了资本主义文化、制度与理论的话语体系的衰落。但是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政客、学者通过玩弄“双重标准”,来转移本国阶级矛盾和各种危机,这既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也造成了世界的动荡不安。因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需要放弃单方面地维持两种意识形态和平共处的幻想,要在有力有理有节的反击中走向成熟。理论成熟的标志是独立自主判断,归根到底是将理论付诸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共建“一带一路”这些话语体系,既不是美国式的,也不是当年苏联式的理念和方案,而是中国自己的

独立自主判断。它避免了像二战后美苏“两个头号大国、两组军事联盟、两种不同制度”全面冲突的对立格局的出现；它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行稳致远，推动了当前世界朝向一个健康的、合理的轨道前进，推进了正摆脱曲折命运中的共产主义世界历史的继续发展。这正是中国的国际关系话语体系有力有理有节的成熟的体现。

不过，从马克思的两个“绝不会”来看，“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具有长期性与艰巨性，而且在共产主义世界历史形成中，两种意识形态、两种制度处于持久战的国际形势。在这种国际形势中，中国永不称霸，但中国仍然需要获取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在全球传播积极向上的中国之声，国际上采纳解决当今世界复杂问题的中国方案，发展中国家借鉴探索世界新文明可能的中国道路。获取国际话语权的最终目的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为解决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的生存和发展的现实问题提供自己的力量。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需要回应中国人民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的现实期待。话语体系只有满足人民现实的需要，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它才真正称得上是一门科学。而这门科学一旦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必将成为一种改造世界的无穷力量。

四、小结

从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来看，中国的话语体系曾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也是世界上至今尚存的唯一的连续性的话语体系。但是到了近代中国，中国的话语体系落后了。少数先贤志士开始引进新的话语体系来打破传统话语体系的落后性。当时有很多种话语体系供中国人民选择，最终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符合当时中国人民对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现实需要。当今中国正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进

行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在整体上落后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此同时，中国的话语权受到资本主义话语体系的制约。从以上两个方面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建设正当时。它必须正视、反思以及解决自身的问题。如果中国能够构建自身独特的话语体系，那么它必将再次使整个中华文明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泽被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人民。

参考文献：

- [1]李长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2-06-04.
- [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16-05-19.
- [3]李君如.以崇高的政治使命建设中国特色话语体系[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1).
- [4]郭湛,桑明旭.话语体系的本质属性,发展趋势与内在张力:兼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立场和原则[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6(3).
-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6]刘勇,郑召利.中国话语体系的结构分析及其构建路径[J].宁夏社会科学,2018(5).
-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9]吴晓明.论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1]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2]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责任编辑 岩 芜)